

传统根基与时代图景： 德国战略文化的演进与重塑*

戴维来

摘 要：二战后，德国逐渐形成了以克制主义、多边主义、经济主义为核心特征的战略文化，塑造了和平主义的国际形象。深受历史记忆影响，德国一贯对军事干预持谨慎态度，倾向于通过国际合作维护国家利益。而冷战结束后，两极阵营对峙的局面不复存在，恐怖主义和地区冲突不断交织，这给德国战略文化带来新的挑战。在坚持和平主义基调的大前提下，德国逐步调整军事政策，在北约框架下积极参与维和与反恐行动，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并始终强调法律程序和必要的审慎原则。俄乌冲突成为德国战略文化转型的关键节点，朔尔茨提出的“时代转折”标志着安全政策的重大变革。国防预算显著增加、军事现代化步伐加快，以及向乌克兰提供较大规模的军事援助，这些都表明德国正从传统的“民事力量”向现实主义与硬实力倾向明显转变。即将上任的默茨政府预计将在安全政策上继续深化调整，但转型道路仍面临国内政治碎片化、政策协调难度加大、历史包袱与现实安全需求之间存在矛盾等诸多挑战。展望未来，德国将致力于在多边主义与欧洲战略自主之间寻求平衡，在承担全球责任和发挥区域领导力间找寻契合点，努力推动国内形成更为广泛和谐的战略共识，以应对日益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

关键词：德国； 战略文化； 外交政策； 安全政策； 身份重塑

作者简介：复旦大学 中国研究院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上海 200433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71(2025)02-0022-21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理论和实践研究”（项目号：23ZDA023）的阶段性生活成果。

战略文化作为一个国家军事安全实践中根深蒂固的信念体系,深刻影响着国家对国家利益的认知和对外行为的选择。对于德国而言,其战略文化深受历史影响,特别是二战后的反思使其形成了以和平与稳定为核心的国家观念。这一文化背景直接影响了德国在安全战略上的取向,促使其优先寻求通过非军事手段和多边合作来保障国家安全。一方面,作为战争肇始国,德国战败后形成了独特的“克制文化”:对武力持谨慎态度,强调多边合作,致力于经济实力的培育。另一方面,德国在融入西方、维护多边体系的过程中“被驯化”,内化了西方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当代德国战略文化在延续传统“根基”的同时,也顺应现实主义回归、欧洲战略自主等时代潮流,实现创新转型。运用战略文化视角透视德国,有助于揭示其战略行为的深层逻辑,把握其未来发展的可能路径。德国案例为完善战略文化理论提供了有益启示:战略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在应对外部冲击下实现动态创新,在历史反思性中适应当下现实,是双重互动、动态塑造的结果。

一、德国战略文化的理论内涵与多重功能

战略文化反映一个国家对外行为背后的深层文化逻辑。它包含一个国家在使用武力、对待战争等方面内化定型的核心信念、价值观和行为逻辑,确立了其战略选择的可能边界。德国的战略文化传承反战、克制的历史记忆,顺应现实主义回归的时代潮流,在传统文化基因与时代需求的博弈中实现转型。

(一) 战略文化的理论定位与分析价值

战略文化是指一个国家在处理国际事务、使用武力、对待战争等方面根深蒂固的信念体系。这一体系包括了该国的历史记忆、文化价值观及社会规范,它们共同塑造了国家对外行为的选择。战略文化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被视为一种深层次的文化逻辑,它不但包含了国家对使用武力的思考方式,也体现了社会塑造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内在思维框架,即文化、规范和观念如何影响国家决策。早期学者如杰克·斯奈德(Jack L. Snyder)就通过研究苏联在核威慑问题上的态度,强调了文化因素对国家战略决策的影响。^① 科林·格雷(Colin S. Gray)^②和卡恩斯·洛德(Carnes Lord)^③等人持续拓展了这一分析维度,认为在考察国家对外行为时,不能局限于

① Jack L. Snyder, "The Soviet Strategic Culture: Implications for Limited Nuclear Operations",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1977, <https://www.rand.org/content/dam/rand/pubs/reports/2005/R2154.pdf>, 访问日期:2024-09-29。

② Colin S. Gray, "Strategic culture as context: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theory strikes back",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5, No. 4, 1999, pp. 49-69, here pp. 49-52.

③ Carnes Lord, "American strategic culture",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 5, No. 3, 1985, pp. 269-293, here pp. 289-290.

物质实力和理性选择模型,还需重视国家内部的信念与价值观。战略文化由此被视为国家的“社会基因”,它在观念层面规定了决策者如何理解国家利益、应对安全威胁以及运用军事力量。

美国学者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从战略文化理论建构的角度出发,将战略文化定义为一个系统的符号体系(例如论证结构、语言、类比、隐喻),这些符号共同构成了国家安全决策的文化框架。在江忆恩的理论框架中,战略文化塑造了军事力量的运用方式和效力观念,是国家安全决策过程的核心影响因素。它决定着决策者如何感知威胁、评估风险并选择相应的应对策略。尽管江忆恩强调战略文化在军事决策中的核心地位,但他同时也认识到自身理论的局限性。他承认,过度聚焦于军事层面的战略文化分析可能会忽视更广泛的文化与价值观对国家整体行为模式的深远影响。^①德国的案例恰好印证了这一点,战略文化不仅体现在武力使用的选择上,也包括对外交多边主义、经济合作与制度化参与的偏好。换言之,国家在制定战略时会综合考量物质利益与文化因素,寻求那些既符合现实需求又与本国深层信念相契合的政策选择。各国复杂的决策过程形成了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战略行为模式,反映出历史经验和文化传统对当代外交安全政策的持久影响。战略文化由此成为连接国家历史记忆、价值观念与当前国际行为的关键纽带,为我们理解国际关系中的行为差异提供了独特且深刻的分析视角。

(二)德国战略文化的现实作用

战略文化研究对于理解国家行为具有重要价值,然而,也有学者指出,单一强调文化的决定性作用可能忽视物质力量、制度约束与理性选择等关键因素。正如格雷所强调的那样,文化应作为整体安全环境的一部分来考察,而非独立于国家利益和国际形势之外。^②就德国而言,强大的经济基础和欧盟框架内的制度网络,为其选择以外交与经济手段达成目标提供了现实支撑。

第一,制度化途径深度融入多边合作框架,赋予对外政策合法性与稳定性。肯·布斯(Ken Booth)认为:“战略文化虽然不是决定性因素,但能在塑造国家行为时发挥重要作用。”^③德国战后历经痛苦反思,为避免再度滑向军国主义深渊,将自身战略理念和行为选择内化于多边框架之下,为其对外政策创造了更高的稳定性与可信度。一方面,德国以历史责任和道德规范为基础,刻意塑造“永不单独行

^① Alastair Iain Johnston, “Thinking about strategic cultur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4, 1995, pp. 32–64, here p. 48.

^② Colin S. Gray, “Strategic culture as context: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theory strikes back”, p. 49.

^③ Ken Booth, “Strategic culture: Validity and validation”, *Oxford Journal on Good Governance*, Vol. 2, No. 1, 2005, pp. 25–28, here p. 25.

动”的国际形象,深度参与国际规则制定过程,以此来彰显自身的合作诚意;另一方面,它又巧妙利用制度回馈机制,在跨国协作中实现利益最大化与影响力外溢。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德国不仅扮演着“经济引擎”的角色,还通过文化与价值观的输出,强化自身的政治号召力并确保欧盟各成员国对其战略走向予以高度认同。江忆恩认为,战略文化的一致性和持续性越强,其影响力就越大。^①由此可见,制度嵌入为德国战略文化赋予了“道义-工具”的双重属性,即在遵循共同规则的同时,借由多边平台扩大外交回旋余地。这种设计体现出传统文化基因与时代需求之间的动态博弈。^②德国将历史经验转化为现代政策实践,在追求国家利益与履行国际责任之间找到平衡点,形成一种兼具原则和弹性的外交路径,增强了其外交行动的正当性,为德国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与信任奠定基础。

第二,推动软硬实力整合,构建全方位影响力体系。传统上,德国因历史教训而对纯粹军事手段抱持相对谨慎的态度。而面对新的地缘政治挑战与全球性危机,军事能力依旧不可或缺,德国的安全角色更侧重于多边框架下的集体安全贡献,以避免在欧洲乃至全球再度引发“安全恐慌”。德国战略文化的精要在于其没有沿用“军力-威慑”的传统思路,而是将经济实力、社会资本与外交倡议融汇成为一套全面的软硬兼济战略体系,并巧妙结合防务与外交、经济与科技等多元手段,形成了独特的以规则构建为先导、以对话协商为桥梁的互动模式,从而使德国在国际舞台上灵活稳健地施展影响力。比如,德国利用其工业优势和创新实力,配合出口管控、外交斡旋以及欧洲层面的共同防务项目,打造了一种以规范塑造为先、以威慑配置为辅的战略。此举既减少了外界对其军事化扩张的历史性疑虑,又可使其在关键议题(如能源安全、网络防护、公共卫生等)持续保持话语主动权与技术领先地位。再如,德国在全球援助、国际危机调停、人道主义倡议、全球气候治理等领域屡屡展现强大软实力;同时,德国还凭借文化输出、高等教育、工业标准以及环保技术,深刻影响着全球思潮与产业模式。从长远看,文化支点与现实需求的互动模式构成了德国在全球治理领域与同盟体系中居于坚实地位的深层逻辑。

第三,展现战略适应与创新能力,实现历史经验与现实需求的平衡。历史上,德国曾深陷军国主义的泥潭,也曾因“二战创伤”而极度排斥动用武力。在全球局势日益复杂的今日,德国一方面坚守“反战基因”,另一方面逐步接受在必要场合通过有限军事或跨国协调来应对恐怖主义、网络攻击、区域冲突等棘手问题。德国战略文化的灵活性体现为对新兴挑战的制度化应对能力,即在欧盟层

^① Alastair Iain Johnston, “Thinking about strategic culture”, pp. 48–50.

^② John S. Duffield, *World power forsaken: political cultur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German security policy after unification*, Redwoo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9.

面推动能源多元化和绿色政策,通过技术创新与法规制定引导能源布局转型,从而降低地缘政治风险。面对气候变化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全球卫生危机等全新挑战,德国试图融合自身工业实力与制度经验,打造跨国合作平台,不断拓展战略文化的影响半径。正是在这种持续更新的轨迹中,德国逐步实现对历史与现实的辩证融合:在警惕军国主义的同时保持战略创新能力,确保战略文化动态适应最新局势发展。

二、德国战略文化的核心要素与特征

德国战略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深刻反映了其历史经验、社会记忆以及国际环境的综合作用,并体现为一套稳定的信念体系和行为模式。从对军事力量的克制与法律约束,到对多边主义的高度认同,以及道义与价值观驱动的外交实践,德国战略文化体现了对历史的深刻反思,是其主动适应国际政治现实发展的结果。

(一)克制主义的安全理念

德国对军事力量的谨慎态度植根于其特殊的历史经验。两次世界大战的失败及纳粹德国军国主义的遗产塑造了德国“克制文化”的核心。托马斯·伯格(Thomas U. Berger)在其著作中指出,德国的“反军国主义文化”诞生于对战争灾难性的反思,这是“独特的历史经验对国家安全行为的深远影响的典型案例”。^①德国知名演员丹尼尔·布鲁尔(Daniel Brühl)认为,德国人在观看战争片时没有任何虚荣感,只有深深的悲伤与羞耻感。^②忏悔式的历史记忆塑造了德国战后的集体心理:一方面是对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彻底否定,将其视为悲剧重演的根源;另一方面是对人道主义、“普世价值”的笃信,试图以文明、理性的方式获得道德救赎。^③于是,德国形成了鲜明的“内疚认同”(Schuld-Identität)与“克制文化”(Zurückhaltung)。^④例如,德国在战后避免使用“地缘政治”“战略”等词汇,担心触碰战争时期极端民族主义的阴影。^⑤语言上的刻意模糊反映了德国战略文化中对权力表达的深层不安,使德国对军事力量的使用始终保持谨慎。“克制

^① Thomas U. Berger, *Cultures of Antimilitarism: National Security in Germany and Japan*, D. C.: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82-134.

^② Daniel Brühl, “We Germans know better than anyone — there are no winners in war”, *the Guardian*, October 24, 2022, <https://www.theguardian.com/film/2022/oct/24/daniel-bruhl-interview-all-quiet-on-the-western-front>, 访问日期:2024-10-17。

^③ Kerry Longhurst, *Germany and the Use of Force: The evolution of German security policy 1990-2003*,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56-58.

^④ Bastian Giegerich, *European Security and Strategic Culture*, Baden-Baden: Nomos, 2006, p. 67.

^⑤ Christopher M. Schnaubelt (ed.), *Towards a Comprehensive Approach: Strategic and Operational Challenges*, Rome: Deltamedia artigrafichesrl, 2011, p. 75.

文化”强调避免军事冒险,以经济复兴为先,并依托多边框架解决国际冲突。

战后德国塑造了一种“民事力量”(Zivilmacht)的国家定位,通过非军事手段解决国际争端,避免触碰邻国的安全神经。这一概念由德国学者汉斯·毛尔(Hanns W. Maull)提出,其核心在于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强调国际法、规则和多边主义的重要性。^①他将“民事力量”总结为三条简单的行动准则:“永不重蹈覆辙”“永不单独行动”和“先政治后武力”。^②这一定位使德国在战后重新融入国际社会的同时,有效避免了因军事实力重建而引发邻国安全焦虑的风险。“民事力量”的塑造是德国社会内部对战争创伤的回应。战后德国的集体记忆将战争视为道德堕落与政治失败的象征,这种记忆被深深印刻在德国的民族心理中。社会心理学家亚历山大·米切利希(Alexander Mitscherlich)和玛格丽特·米切利希(Margarete Mitscherlich)指出,战后德国社会普遍存在一种“集体自恋”的心理防御机制,即通过对纳粹罪行的批判以及对自身受害的夸大,来逃避更深层次的内疚感。^③战争记忆成为塑造其战略文化的特殊因素。它在德国国内政治转型过程中得到制度化巩固,并展现出显著的历史延续性。正如克里·朗赫斯特(Kerry Longhurst)所观察到的,即使德国在统一后面临全新的地缘政治环境,其安全文化的核心特征仍基本保持稳定。^④社会学家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指出,战后德国是一个“后主权国家”,必须通过让渡主权、追求集体安全来化解其存在困境。^⑤德国的军事克制可以是其“身份政治”的战略性工具。德国通过强化军事克制塑造了“道德高地”的国家形象,将克制转化为一种“软权力”资源,从而在国际社会中赢得更多道义资本,在“低成本领导”中获取政治红利。

德国的法律和制度框架进一步强化了其军事力量的谨慎态度。1949年颁布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明确规定德国不得发动侵略性战争(第26条),并对武装力量的部署和使用设置了严格的法律约束。《基本法》第87a条规定,德国的武装力量联邦国防军的建立仅用于防卫目的。《联邦国防军法》进一步明确军队接受议会监督,将联邦国防军的建军目标确立为“穿军装

① Hanns W. Maull, “Germany and Japan: The New Civilian Powers”, *Foreign Affairs*, Vol. 69, No. 5, 1990, pp. 91–106, here pp. 92–93.

② Hanns W. Maull, “Germany and the Use of Force: Still a ‘Civilian Power’?”, *Survival*, Vol. 42, No. 2, Summer 2000, pp. 56–80, here pp. 66–67.

③ Alexander Mitscherlich/Margarete Mitscherlich, *Die Unfähigkeit zu trauern: Grundlagen kollektiven Verhaltens*, München: Piper Verlag, 1967.

④ Kerry Longhurst, *Germany and the Use of Force: The evolution of German security policy 1990–2003*, p. 14.

⑤ Ralf Dahrendorf, *Society and Democracy in Germany*, New York: W. W. Norton, 1967, p. 95.

的公民”(Staatsbürger in Uniform),^①并将其定义为“防御性力量”。“议会军队”(Parlamentsarmee)制度赋予了议会对军事行动的实际决策权。联邦宪法法院的“海外行动”判决明确规定,任何军事行动原则上都需要议会决定性的事先同意,^②这大大限制了政府在军事行动上的自主权,增强了议会对军队的控制,确保了军事力量的使用受到严格的法律和政治约束。这种制度安排与美国等国家总统拥有更大军事行动自主权的模式形成鲜明对比。德国强调在强化的国际法体系范围内采取多边做法的重要性,坚持主要运用非军事手段应对安全威胁,主张在国防政策的各个方面发挥强有力的民事作用。^③同样,德国对武器出口的严格限制也体现了其战略文化中的克制倾向。根据德国武器出口政策,武器交易必须符合道德与法律标准,优先考虑人权与国际安全。这种对军事工业的限制展现了德国对和平主义的承诺,使其在国际社会中塑造了“规范性力量”(Normative Power)的形象。

然而,德国的“反战与克制”战略文化并非没有争议。在全球安全环境日益复杂化的背景下,这种立场面临现实挑战。一方面,德国的盟友(尤其是美国和北约)不断呼吁德国承担更多的国际安全责任,加强军事能力;另一方面,德国国内也存在是否需要重新审视和平主义传统的辩论。例如,俄乌冲突爆发后,德国在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的问题上表现积极,引发了外界对德国坚守“反战”战略文化的质疑。德国在对外政策中的自我认知正在发生变化,它正逐渐摆脱过去作为“民事力量”的传统角色。随着这种角色在过去二十年中影响力的减弱,德国正在向更加主动的“安全保障者”身份转型。^④

(二)多边主义的外交倾向

多边主义反映了德国战略文化的外交政策选择。后冷战时代,德国通过参与欧盟、北约等多边机制,努力打造对其有利的国际秩序。多边合作增强了德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同时也为其安全战略提供了必要的法律基础。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德国的安全战略通常优先考虑与盟友的协作,以实现集体安全目标。德国视欧洲一体化为自身安全和繁荣的基石,并将欧盟的稳定和发展视为国家利益的核心,通过参与塑造欧盟的规则和规范来影响欧洲乃至全球的秩序。美国历史学家

① Federal Ministry of Defence of Germany, “The Bundeswehr’s Basic Training — An Overview”, <https://www.bundeswehr.de/en/about-bundeswehr/ranks-and-careers/basic-training#:~:text=Basic%20training%20in%20the%20Bundeswehr,bivouac%20in%20the%20open%20air>, 访问日期:2024-10-20。

② “DFR — BVerfGE 90, 286 - Out-of-area-Einsätze”, <https://www.servat.unibe.ch/dfr/bv090286.html>, 访问日期:2024-10-20。

③ Paul Belkin, “Germa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Trends and Transatlantic Implication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May 20, 2009, pp. 1-25, here p. 13.

④ Patrick A. Mello, “Zeitenwende: German Foreign Policy Change in the Wake of Russia’s War Against Ukraine”, *Politics and Governance*, Vol. 12, 2024, pp. 1-16, here pp. 11-12.

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将此形容为“规则型霸权”,他强调所谓“基于规则的秩序”实质上是霸权的附属物,旨在促使对现状不满的强国遵循这些规则。^① 这一观点强调了制度性权力在塑造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而德国在欧盟内部的领导地位恰恰体现了制度性权力。

德国对国际规则和多边机制的坚定支持是其战略文化的重要体现。二战后,德国积极参与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多边机构的活动,将其视为维护国际秩序和促进全球治理的重要手段。德国将自己定位为“稳定性贡献者”,通过遵守和践行国际规则来维护国际秩序。这种做法与那些试图通过单边行动来追求自身利益的国家形成鲜明对比。具体而言,德国在多边外交中的实践包括: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和人道主义援助(例如,参与科索沃维和行动);在诸如气候变化、核裁军和难民危机等全球性问题上倡导多边合作(例如,积极参与《巴黎协定》的谈判和执行);通过欧盟框架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全球治理机制及制定更具雄心的环保标准。德国前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被誉为“气候总理”,她在国际场合多次呼吁全球重视气候变化的紧迫性并采取行动。德国的气候政策与能源安全战略紧密结合,反映了其战略文化中的长期规划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到2030年,德国80%的电力将来自可再生能源。^② 德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长罗伯特·哈贝克(Robert Habeck)曾指出,“只有发展更多的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源效率,才能加强我们的独立性。”^③德国还致力于促进国际贸易规则的公平性和透明性,这与其作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的地位及对全球化的认同密切相关。德国积极参与并支持多边机制,体现了其在国际社会中所扮演的建设性角色及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坚定信念。

(三)经济主义的地缘经济思维

德国战略文化历来高度重视经济实力,将其视为国家国际影响力的核心支柱。德国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地缘经济”(Geo-economics)思维模式,该模式以现实主义商业政治观念为核心,强调通过经济手段达成国家战略目标,凸显了经济因素在维护国家利益中的重要地位。德国问题研究专家斯蒂芬·沙博(Stephen Szabo)

^① Robert Kagan, “A Free World, If You Can Keep It: Ukraine and American Interests”,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23,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robert-kagan-free-world-if-you-can-keep-it-ukraine-america>, 访问日期:2024-10-25。

^② Vera Eckert, “Germany throws weight behind energy transition to defend its turf”, *Reuters*, February 21, 2023,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energy/german-econmin-highlights-measures-boosting-energy-transition-2023-02-21/>, 访问日期:2024-10-30。

^③ Nikolaus J. Kurmayer, “Habeck launches energy-saving campaign backed by leading associations”, *Euractiv*, June 10, 2022, <https://www.euractiv.com/section/energy/news/habeck-launches-energy-saving-campaign-backed-by-leading-associations/>, 访问日期:2024-10-30。

在《德国、俄罗斯和地缘经济的兴起》中指出,德国倾向于通过经济手段来制定国家政策,并在经济利益与其他价值之间寻求平衡。德国的地缘经济文化使其在调整重大政策时往往持谨慎态度。^①与传统依赖军事力量的大国不同,德国更多地依托经济实力,通过贸易、投资、经济互联以及国际规则制定,追求稳定与和平,同时积极参与国际秩序的塑造。这一战略取向体现为促进经济相互依赖以降低冲突发生的风险,将贸易作为外交政策的重要工具,以及强调经济软实力而非军事硬实力的影响力。

德国的地缘经济思维可以追溯到战后欧洲一体化初期,特别是1951年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成立。德国与法国共同管理煤炭和钢铁等关键资源以消除战争根源,由此开创了以经济合作驱动和平发展的创新模式。这一理念成为欧洲和平秩序的基石,深刻塑造了德国的战略文化。尽管近年俄乌冲突对该合作模式产生一定影响,但德国的地缘经济思维依然占据核心地位。德国将发展和维护贸易关系作为实现外交目标的重要手段。作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和出口导向型国家,德国的经济成功高度依赖外贸,贸易政策是其经济战略核心,构成其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德国借助全球贸易关系构建了广泛的经济网络,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在中欧和东欧地区,通过直接投资和贸易合作,德国重塑了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并将其纳入德国主导的欧洲经济体系。在全球层面,德国推动自由贸易协定与多边贸易规则的制定,保障自身在全球化进程中的经济利益。德国积极参与欧盟与日本、加拿大等国家的自由贸易谈判,利用这些协议巩固“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贸易体系。同时,德国的贸易政策在面对国际大国竞争时体现出务实和平衡的特点,例如,在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的背景下,德国努力在中美之间维持平衡,同时推动欧盟加强战略自主,以减少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并在关键领域保持竞争力。

(四)道义主义的价值认同

德国道义外交的深层逻辑根植于对历史创伤的深刻反思和对文明价值的认同。纳粹罪行和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集体记忆不但成为德国国家自律的道德起点,也转化为外交政策的文明自觉。因此,德国将“文明认同”与“道义追求”作为其对外交往及国际责任的核心底色,力图在维护人权、促进和平、推动多边合作的过程中扮演建设性角色。文明主导的道义外交将德国推向了国际“道义力量”(Moral Power)的前沿,使其成为当代全球治理格局中的重要价值标杆。康德“永久和平”的理想为德国道义外交思想的知识谱系提供了哲学基石,其主张以道德律令为国

^① Stephen F. Szabo, *Germany, Russia, and the Rise of Geo-Economics*, 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14, p. 8, p. 30.

际关系原点,构建基于共和政体、国际法与世界公民权三重维度的和平秩序。^①同时,马克斯·韦伯“责任伦理”的现实主义批判亦深刻塑造了德国对外行为的辩证思维。责任伦理强调,政策动机必须与对后果的理性评估并重,警惕单纯道义诉求可能导致的悖论。履行“责任伦理”最重要的就是要顾及后果,尤其是可预知的后果,因为“政治行为的最后结果往往与初衷相悖,甚至截然相反”。^②德国以平衡动机与后果、道义与责任的伦理实践,逐渐在国际事务中塑造出一种兼顾信念与理性的声音。正如默克尔所言,德国既要致力于道义诉求,又要立足现实需求;既要坚持多边主义,又要善于运用硬实力;既要融入跨大西洋体系,又要推进欧洲自主。^③冷战结束后,德国逐步主动参与多边框架下的域外军事行动,每一次动用硬实力总会强调合法性审查和慎重取舍,力求价值与利益相互嵌合,努力塑造兼具道义影响力与务实领导力的现代国家形象。

三、德国战略文化的动态演进与现实挑战

德国战略文化的发展深刻体现了其历史经验的沉淀与国际环境变迁的交互作用。从冷战后的延续与转型,到俄乌冲突背景下的重塑,再到内部异质性与多元诉求的综合平衡,德国战略文化在动态演进中展现了复杂性与适应性。

(一)冷战后德国战略文化的转型

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不断演变的背景下,德国作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其战略文化正经历深刻转型。此次转型不但关系到德国自身的国家安全和外交方针,同时也影响着整个欧洲乃至全球的安全环境。德国战略文化的转型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战略地缘定位的重塑。冷战时期的分裂格局将德国异化为两种地缘政治范式的试验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作为北约“前沿堡垒”,其安全战略始终处于“依附性自主”的矛盾状态。在主权受限的框架下,德国通过深度融入西方体系换取安全保障,形成安全外包于美国和北约的路径依赖,塑造了“克制文化”的集体心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则成为苏联阵营的战略缓冲带,其军事存在服务于华约的攻防体系。两德统一打破了人为的地缘割裂,但统一后的德国面临更复杂的战略选择:既要避免重蹈“地缘支轴”的历史覆辙,又要承担整合欧洲的领导者责任。具体表现为德国开始主动参与北约东扩进程,通过欧盟与北约双轨扩张

① [德]康德:《永久和平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② [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02页。

③ Angela Merkel, “Speech by Federal Chancellor Dr. Angela Merkel on the Occasion of the 51st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Munich, February 7, 2015, <https://securityconference.org/en/medialibrary/asset/speech-by-angela-merkel-1303-07-02-2015/>, 访问日期:2024-11-08。

来稳定中东欧安全环境；同时开展“接触推动变革”政策，尝试将俄罗斯纳入欧洲安全架构。德国积极塑造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推动欧盟从单纯经济共同体向具有战略自主性的安全行为体转型。这标志着德国已突破冷战时期被动防御的战略思维，转而扮演更具建构性的安全角色，在保持多边框架优先的同时，开始有选择地行使地区主导权。

二是社会-政治共识的重构。统一后的德国一度陷入国家身份认同困境。一方面，由于冷战时期东西德不同的历史轨迹和文化发展，其民主制度与社会价值观之间产生了显著的内在张力；另一方面，历史负罪感衍生的“文明国家”理念，与作为欧洲核心大国所承担的国际责任期待形成对比。德国政治精英开始重新诠释责任的内涵，将其从消极的对外不干预政策扩展为积极的“有条件干预”。关键在于，德国政治家成功地将军事力量的运用重新框定为“保护的责任”与“多边合法性”的交叉产物，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权力政治工具。在公共话语上，从单一的历史负罪感向复合的历史责任感的转变，令德国社会能够在不违背历史教训的前提下，逐步接受对有限军事手段的合法使用。社会层面的讨论也从简单的二元对立（参与或不参与）演变为对军事行动条件、范围与目标的多层次辩论，形成了以“有限度干预”为中心的新共识。其实质是德国战略文化在保持和平主义核心的同时，对责任政治内涵进行了创造性拓展，在集体心理层面出现从“克制文化”到“责任文化”的范式转换。

三是关键事件触发的实践转型。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成为德国战略文化转型的重要转折点，标志着德国迈出从“绝对克制”向“有限主权”转型的关键一步。德国以人道主义干预为理由，在北约框架下首次参与了军事行动。这一事件的深远影响在于打破德国不派遣军队参与境外作战的禁忌，启动了德国军事决策机制的系统性重构。尽管这一决定在国内引发强烈争议，但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裁决认为，多边框架下的人道主义行动符合国际法及德国《基本法》的精神。科索沃危机后，德国进一步建立了结合人道主义保护、多边合法性与议会监督的军事行动授权机制，并在阿富汗战争中从后勤支援转变为承担战斗任务，标志着其军事力量投送能力与决策体系渐趋成熟，为德国在日后国际事务中的安全角色拓展奠定了制度与心理基础。

进入21世纪，尤其是在“9·11”事件后，德国逐步调整其军事政策，尤其是在反恐与国际维和方面的立场更为明确。在美国的压力下，德国重新定义了国防任务，强调反恐斗争的必要性。2003年，施罗德政府发布的《国防政策指导方针》明确指出，常规武装冲突已不再对德国构成直接威胁，恐怖主义成为新型安全挑战。^① 在

^① Bundesministerium der Verteidigung in German, “The History of the German Army”, <https://www.bundeswehr.de/en/about-bundeswehr/history/history-german-army>, 访问日期: 2024-11-16。

这次政策调整中,德国开始倡导全面安全概念,将打击恐怖主义视为德国联邦国防军的新任务。这一战略巧妙融合了历史反思与现实主义,为德国在国际事务中增强参与度指明了新的方向。2006年,《联邦国防军驻外行动法》的通过,将维和与反恐等非传统军事行动纳入法律框架,进一步拓宽了德国军事力量的运用空间,为其在国际合作中发挥更主动的作用奠定了基础。不过,德国在军事行动的决策上仍受到法律和程序的严格约束,例如在对伊拉克战争的态度上德国持保守态度。德国认为,伊拉克战争是美国对伊拉克实施政权更迭和军事占领的结果。这一立场表明,尽管德国积极参与反恐行动,其外交政策总体上依然保持“有限主权”的理念,避免陷入与自身利益相悖的战争。^① 德国的“有限主权”转型增强了其在全球事务中的参与度,构建出一种“负责任的领导者”形象。

当美国转向单边主义与战略收缩时,欧洲对跨大西洋安全纽带的未来产生疑虑。德国没有急于与美国撕裂关系,而是一边加强自身防务能力,一边在北约框架下与盟友保持密切对话。^② 在中东冲突、难民潮和对俄罗斯制裁等关键议题上,德国也逐步展现出更大的自主决策空间,与美国的立场出现分歧。这实际反映了德国更复杂的战略思考,即在确保集体防御基础不动摇的同时,为欧洲开拓独立安全空间,从而降低美国安全承诺变化带来的风险。德国由此获得了在多极化世界中保持一定程度战略灵活性的能力,摆脱了冷战时期单一依附的战略局限。当前德国的战略选择揭示了中等强国的生存智慧:在霸权秩序松动时,以制度为杠杆撬动变革,用规范叙事包装利益诉求,借多边框架掩护自主行动。

(二)俄乌冲突背景下的战略文化重塑

俄乌冲突的爆发,对于德国战略文化而言无疑是一场重大的“压力测试”,深刻撼动了德国社会长久以来对军事与安全事务的传统认知,同时创造了德国在地缘政治转型方面的历史性拐点。德国一贯坚持以多边合作、和平对话为首要手段,认为只有通过国际组织与经济交流才能最大程度地化解冲突风险。这与二战以来德国民众对“克制文化”的执着密切相关,同德国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强调制度化、规范化的努力相吻合。但是,俄乌冲突的爆发与持续升级迅速让德国政府和社会意识到,仅靠既往“和平主义”的惯性思维,恐怕无法有效应对日益严峻的现实威胁。俄乌冲突不仅让欧洲安全架构再度面临冷战结束后的最大考验,也直接加速世界

^① Peter Rudolf, “The Myth of the ‘German Way’: German Foreign Policy and Transatlantic Relations”, *Survival*, Vol. 47, No. 1, 2005, pp. 133–152, here pp. 144–145.

^② Molly O’Neal, “The Risks to Germany and Europe of a Prolonged War in Ukraine”, the Quincy Institute, October 7, 2024, <https://quincyinst.org/research/the-risks-to-germany-and-europe-of-a-prolonged-war-in-ukraine/#h-german-domestic-politics-scrambling-party-configuration-and-popular-anxiety>, 访问日期:2024-11-20。

秩序的重塑并强化大国竞争格局。在此背景下,德国不得不对自身战略文化理念进行重大调整,包括加强硬实力建设与全面升级安全政策体系。具体措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宣布“时代转折”。俄乌冲突迫使德国重新审视以和平主义和克制为核心的战略文化,并迅速调整安全政策以适应新形势。2022年2月,德国总理奥拉夫·朔尔茨(Olaf Scholz)在议会发表的“时代转折”(Zeitenwende)演讲,体现出德国打破长期以来的战略文化禁忌以及增加国防开支的决心。在演讲中,朔尔茨呼吁为武装部队提供1000亿欧元的特别基金。尽管这一提议在他所属的社民党内引发震惊,但得到了议会主要党派和广泛的社会支持。这一举动标志着德国安全和外交政策的深刻转变。克里·朗赫斯特(Kerry Longhurst)称,德国的战略文化“既描绘了又限制了”政策选择的范围。^①朔尔茨将这一历史性变化称为“时代转折”,这一术语迅速被国际媒体广泛引用。他明确指出,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赖以运作的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必须作出一系列调整。他将俄罗斯视为“侵略者”,并提出一系列应对措施,包括加强对乌克兰和德国自身武装力量的支持、推动欧盟安全政策实施、实现能源供应多元化和提升德国社会及国家的复原力。^②此外,朔尔茨还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文章《全球时代转折》(The Global Zeitenwende),系统阐述了全球正在经历的一场划时代的结构性转变。他强调,俄乌冲突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而新兴大国(如中国)正以其经济实力和政治自信重塑全球秩序。朔尔茨指出,德国的民主、安全与繁荣直接依赖于国际秩序有效运转和对共同规则的切实维护。^③在这一背景下,朔尔茨宣布德国将承担更多责任,成为“欧洲安全的保障者、欧盟内部的桥梁搭建者以及全球问题多边解决方案的倡导者”。^④德国承诺采取一系列行动,包括取消向冲突地区出口致命武器的长期禁令、大幅增加国防开支以及停止“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

二是实施军费开支与军事改革。自2014年以来,德国每年的国防预算已逐步

^① Kerry Longhurst, *Germany and the use of force: The evolution of German security policy 1990 - 2003*, p. 16.

^② “Policy statement by Olaf Scholz, Chancellor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and Member of the German Bundestag”, 27 February 2022, <https://www.bundesregierung.de/breg-en/news/policy-statement-by-olaf-scholz-chancellor-of-the-federal-republic-of-germany-and-member-of-the-german-bundestag-27-february-2022-in-berlin-2008378>, 访问日期:2024-11-28。

^③ Olaf Scholz, “The Global Zeitenwende. How to Avoid a New Cold War in a Multipolar Era”,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23,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germany/olaf-scholz-global-zeitenwende-how-avoid-new-cold-war>, 访问日期:2024-11-28。

^④ 同上。

增长,但直至俄乌冲突爆发前,军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依然未能达到北约要求的2%目标。2022年起,德国军事开支增长加速,2024年的军费开支超过690亿欧元(以2015年不变价格计算),是2014年的将近两倍。^①这一增长态势主要源于北约持续施加压力以及德国在欧洲安全事务中承担更多责任。德国政府大幅提升国防开支的举措赢得了相当程度的跨党派支持。根据德国科尔伯基金会2024年11月公布的民意调查,65%的受访者认为德国应该增加国防经费的投入。^②这一现象表明,德国社会在面对外部威胁时,已实现了认知范式的实质性转变。从政策执行层面看,德国在2024年开启了自冷战结束以来最全面的军事改革计划,通过扩充军队人数、更新主战装备、强化军事训练与指挥体制等方式提升整体快速反应能力。同时,德国按照计划稳步增加国防开支,以回应北约战略要求,强化其在欧洲防务定位上的话语权。当然,这种转向并不意味着德国抛弃了和平主义传统,而是将过去长期被忽视的硬实力要素纳入新的安全战略框架之中。

三是改变人道主义干预与武器供应态度,提升区域安全责任。俄乌冲突爆发初期,德国延续了相对谨慎的立场,对向乌克兰提供致命性武器持保留态度,主要提供头盔、医疗物资等非致命性援助,希望以此体现自己在欧洲与全球舞台上的“和平倡导者”身份。这一立场导致盟友不满和批评。随着战争局势的迅速演变以及欧盟与北约盟友对德国出台更明确援助措施的呼声,德国逐渐意识到,若继续停留在对话与经济制裁层面,会在一定程度上被盟友指责为坐享安全红利而不作为。尤其是在俄乌冲突进一步加剧的背景下,德国面对的舆论与外交压力与日俱增,亟需在多边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寻找新的平衡点。在内外压力下,德国在对乌军事援助上渐渐加码,最终向乌克兰提供“猎豹”防空系统、“豹”2主战坦克等重型武器,这标志着德国在“要不要、何时以及如何使用武力”这一关键问题上有了全新答案。这一转变深受两大因素驱动:一方面是欧洲地缘政治形势急转直下的现实倒逼,另一方面是北约和欧盟内部对德国集体防御责任分担的结构性期待。随着冲突的持续和欧洲加强防御一体化需求的增长,德国意识到,如果仍坚持传统的防守式立场,恐难以履行其作为欧洲经济领袖的政治责任,甚至导致其在关键安全事务中失去战略主导权和话语权。

① “Defence Expenditure of NATO Countries (2014 – 2024)”, https://www.nato.int/nato_static_fl2014/assets/pdf/2024/6/pdf/240617-def-exp-2024-en.pdf, 访问日期:2024-12-02。

② John Vandiver, “German poll shows approval for more defense spending as NATO steels itself for Trump 2.0”, Stars and Stripes, November 12, 2024, <https://www.stripes.com/theaters/europe/2024-11-12/germany-defense-spending-trump-15822029.html>, 访问日期:2024-12-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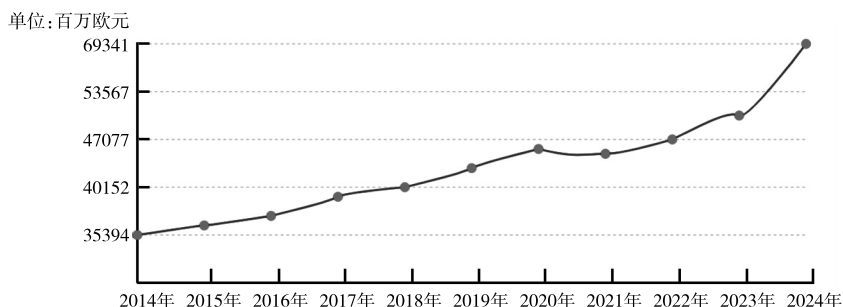


图1 2014—2024年德国军费开支情况

来源:“Defence Expenditure of NATO Countries (2014 - 2024)”, https://www.nato.int/nato_static_fl2014/assets/pdf/2024/6/pdf/240617-def-exp-2024-en.pdf, 访问日期:2024-12-02。

在具体的战略布局上,德国在北约框架内系统性强化了对东翼盟国的防务支持,积极与波兰、波罗的海三国等东欧国家展开更紧密的军事合作,并承诺为立陶宛提供常驻旅,协助其应对自身安全威胁,尤其是加强波罗的海区域上空的巡逻和联合训练,大幅提升了对北约盟国和当地驻军的支持力度。此外,德国也更加踊跃地参与欧盟内部的防务合作机制,包括“欧洲防务基金”(EDF)、“永久结构性合作”(PESCO),并对欧盟快速反应部队等项目提供支持,希望借此大幅提升欧洲在关键军工技术、联合行动与后勤保障方面的自主能力。在德国支持下,截至2024年12月,PESCO已发展为涵盖军事训练、陆海空作战系统、网络安全、战略通信及联合作战能力等66个具体项目的综合防务合作平台。^①德国还深度参与欧盟针对乌克兰的“豪猪战略”。这一战略核心在于试图将乌克兰打造成为“武装到牙齿”的防御实体,通过低成本非对称防御手段,使乌克兰成为难以攻克的军事目标。^②德国这些战略调整清晰地勾勒出其角色转型轨迹,即从过去低调务虚的“和平倡导者”,转向兼具实力与担当的“区域安全塑造者”。德国将具体军事能力建设与战略责任承担紧密结合,形成更加全面的安全政策组合。

虽然硬实力在德国战略文化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但德国也并没有完全背弃二战后形成的内在价值观。德国依旧珍视对跨大西洋同盟机制以及国际法治、规则秩序的维护,注重通过制度化方式来应对全球性挑战。德国执政者深知,单纯军事力量难以支撑国家的全球角色,因此在气候变化、数字主权和人道危机管理等领域保持积极参与姿态。德国在提供军事援助的同时,坚持尽

^① “Permanent Structured Cooperation”, <https://www.pesco.europa.eu/>, 访问日期:2024-11-20。

^② European Union, “Joint White Paper for European Defence Readiness 2030”, March 19, 2025, https://defence-industry-space.ec.europa.eu/document/download/30b50d2c-49aa-4250-9ca6-27a0347cf009_en?filename=White%20Paper.pdf, 访问日期:2025-03-25。

可能地保留以外交谈判为中心的危机管控渠道，例如，朔尔茨在卸任前4个月曾同普京通电话谈及政治外交等多项议题。德国在武器援助问题上也表现出谨慎态度，担心提供射程过远或技术过于敏感的武器可能导致冲突升级，让德国陷入与俄罗斯直接对抗的风险，并在国内政治层面掀起更大的争议。2024年下半年德国选择党(AfD)在东部选举中的强势表现表明，德国社会对武器援助的看法存在分歧。这促使德国主流政党重新思考如何在支持乌克兰与防止战争扩大之间寻找平衡点：既要维护和平主义传统价值观，又不能放弃对盟友的实质支持。

(三)德国战略文化的内在张力与外部挑战

德国的战略文化正经历着深刻的转型，德国面临国内政治格局与政策协调的内在张力和国际环境的外部挑战。

从内部来看，第一层张力来源于碎片化的政治格局与政策协调的困境。尽管德国在冷战后长期以“克制文化”和和平主义作为政策基调，并通过多边主义与经济合作取得了不俗的国际影响力，但俄乌冲突的爆发与持续严重冲击了“民事力量”思维。德国政治生态也因多党竞争和执政联盟支持率的下滑而日益碎片化。传统上占主导地位的基民盟/基社盟与社民党已难以独揽全局，越发需要绿党、自民党等其他政治力量的支持。但是，这些不同党派在军事与安全事务上的立场差异甚大，让德国政府在应对复杂国际局势时难以形成稳定共识。朔尔茨领导的三党联合政府在初期的民调中曾有过半支持，但其支持率自2022年以来下滑明显，到2024年末已降至32%，在2024年12月的联邦议院信任投票中更是未能达到多数。^①政治动荡直接导致提前大选，使得未来德国的政策走向又蒙上了一层不确定阴影。尽管在2025年2月，联盟党以28.6%的得票率重回议会第一大党，但其需要与其他政党合作达成议会多数，组建联合政府。这是德国大选中支持率最高的政党的历史最低得票率，也是联盟党总理候选人得票率的次低纪录。政治碎片化还体现在德国选择党的迅猛崛起上，尽管其支持率在2024年底因丑闻而略有滑落，但在新一届议会大选中却以创纪录的得票率首次跃升为第二大党。这恰好说明，相当一部分选民对现行路线不满，更支持民族主义、反对移民并认同退出欧盟的政策主张。社民党在朔尔茨执政时期完成了某种意义上的转型，包括支持大幅提高军费、设立特别国防基金并向乌克兰提供重型武器等，这在社民党传统的政策立场审视下是颇具争议的。此外，派系分裂在左翼党内部根深蒂固，东部的民社党历来存在改革派和正统派之间的冲突，而西部的劳动与社会公正选举联盟本身就

^① “Pollytix german election polling trend”, Pollytix Strategic Research, <https://pollytix.eu/pollytix-german-election-trend/>, 访问日期: 2024-12-07。

是社民党政党分裂的产物。^①2024年初,由前左翼党政治人物莎拉·瓦根克内希特(Sahra Wagenknecht)等人创立“莎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理性与正义党”(BSW)打破了传统政治光谱,试图以另一种左翼民粹路线为基础,强调“东方政策”与对俄和解,在东部选区获得不少选票。

第二层张力来源于德国在财政与社会结构问题上所面临的难题。俄乌冲突使欧洲安全环境急剧变化,北约不断对德施压,要求德国尽快落实增加军费的承诺。然而,德国联邦国防军长期存在装备老旧、用人紧缺和管理效率低等亟待解决的问题,若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重构,所需开支远超政府此前预估。尽管德国官方已经承诺将国防预算在2024年后逐步提升至GDP的2%,但这一计划在激烈的公共预算竞争中面临重重障碍。尤其是绿党与部分左翼人士主张将气候与环保、社会福利及教育平等议题放在优先位置,对军费持续增长持戒备态度。加之通胀和能源危机带来的社会压力,确立坚定且持久的国防投入机制并非易事。因此,德国战略文化所呼吁的“硬实力”回归,在预算层面就面临难以落实的现实尴尬。

第三层张力来源于德国统一后持续存在的东西德差异,该因素往往被忽视,却深刻影响了战略文化的形成。前东德地区在经济发展和国际观念上明显落后于西部。部分东部民众对快速融入西方体制后所面临的社会和经济代价始终心存不满,对被视作“主流”的跨大西洋合作路径也相对冷淡,往往更希望维护与俄罗斯等国的务实关系。东部民众对移民浪潮、环保激进政策与军费攀升的担忧普遍更多,这为右翼政党在当地的迅速扩张提供了社会基础。相比之下,前西德地区自冷战以来就深受美国与西欧价值观的影响,主流舆论更认可对俄强硬以及支持乌克兰等政策,从而产生了显著的区域分化。另外,德国历来存在央地两级利益集团影响外交与安全政策的传统,例如侧重跨大西洋关系的德国对外关系协会(DGAP)以及推动欧洲战略自主的科学与政治基金会(SWP)等,这些机构对政府决策的影响不容小觑。如此纷繁的内外诉求导致德国战略文化在实际政策上时常出现摇摆与纠结。

从外部挑战来看,国际环境尤其是俄乌冲突深刻改变了欧洲安全格局,迫使德国重新审视其战略文化。

俄乌冲突对欧洲安全架构的强烈冲击,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模糊不定的外交政策走向,让德国原本依赖的跨大西洋体系稳定性大打折扣。德国早在二战之后就背负了强烈的历史包袱,对于军事力量的使用保持高度警惕。当军事对抗再次成为影响欧洲命运的核心变量时,“克制文化”显然难以满足德国的实际需求。很

^① 伍慧萍:《欧洲激进左翼政党的分裂与蜕变:以德国为例》,载《世界社会科学》,2024年第6期,第106-125页,这里第107页。

多德国政治家与智库专家都认识到,德国若不能在北约与欧盟内部承担更多安全责任,就可能失去在欧陆事务中的领导地位。德国外长安娜莱娜·贝尔伯克(Annalena Baerbock)曾称,“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迫使我们德国人以不同的方式思考我们在世界上的角色……我们对位于欧洲中心的自身安全威胁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通过综合安全政策,在欧洲及其他地区的外交政策新阶段中承担我们的责任”。^① 俄乌冲突让德国不得不更加重视军费投入与防御能力建设,但和平主义传统在德国国内依然有广泛的社会基础,致使政府的任何涉军举动都面临不同程度的质疑与制约。根据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的调查,49%的德国民众属于支持尽快通过谈判结束冲突的“和平”阵营,而主张追求乌克兰军事胜利的“正义”阵营的支持率仅为19%。在武器援助问题上,民意同样存在显著分歧:41%的受访者认为当前援助水平适当,30%的受访者认为援助过多,21%的受访者认为援助不足。值得注意的是,53%的民众认为政府在寻求外交解决方案方面做得不够。^② 这些矛盾最终在德国对乌武器援助的争议中集中爆发:政府一方面不断加码,如援助“豹2”主战坦克等重型武器;另一方面又迟迟不愿提供远程导弹,以免与俄罗斯进一步对峙,引发更多冲突。

多边主义始终是德国战略文化的重要支柱。若希望欧洲成为一个真正有影响力的外交政策行为体,德国就必须投入更多资金和资源。^③ 如今国际格局多极化趋势不断增强,特朗普“美国优先”战略对德国造成重大冲击,致使德美关系在对俄制裁、贸易分歧以及欧洲防务自主等问题上呈现复杂博弈态势。德国虽致力于维护多边机制,积极倡导以欧盟为核心构建整体防务体系,但其在防务领域的主导地位又容易被欧洲其他国家视作“德国中心主义”。在纷繁多变的国际博弈面前,德国要在强调欧盟内部团结与维护自身经济利益之间找到平衡,殊为不易。对华政策亦是如此,德国需要维持与中国的经贸联系,但特朗普式大国竞争策略卷土重来,美方持续施压要求欧洲配合其对华强硬立场,这类外在压力使德国在平衡多边主义原则和国家利益时陷入困境。

气候变化、能源转型与经济下行等多重危机的叠加,使德国在内部资源调配与外交优先次序上面临更大考验。原本高度依赖俄罗斯天然气的德国,在俄乌冲突爆

^① Annalena Baerbock, “Russia’s war on Ukraine has forced us in Germany to think differently about our role in the world”, *the Guardian*, July 6, 2023,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commentisfree/2023/jul/06/russia-war-ukraine-germany-foreign-policy>, 访问日期:2024-12-18。

^② Molly O’Neal, “The Risks to Germany and Europe of a Prolonged War in Ukraine”.

^③ “Special Edition of the Munich Security Report on Germa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MSC, October 2020, https://securityconference.org/assets/user_upload/MSR_Germany_Report_10-2020_Engl.pdf, 访问日期:2024-12-20。

发后不得不对能源进口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但由此带来的通胀与企业竞争力下滑对国内稳定产生了负面效应。德国需要大量财政支出来发展可再生能源,短期内很难兼顾军备扩张与社会福利等多元需求。疫情带来的财政负担也尚未完全消化,导致政府更难在外交、防务方面投入更多。如此一来,德国既无法简单回到“民事力量”与“和平主义”的老路,也难以彻底进行“现实主义”式的全面武装。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跨大西洋关系态度反复无常的背景下,欧洲需要“独立”而又“团结”,但如何落实尚无成熟答案。对于德国而言,它亟需增强社会凝聚力与外交灵活度,以便在日益复杂的大国竞争与欧洲一体化进程之间重新定位自身战略角色。弗里德里希·默茨(Friedrich Merz)面对一个与自己“老对手”默克尔时代截然不同的内外环境,他所能做的,或许只有在国内政治的博弈与国际形势的倒逼之下,不断寻找更恰当的战略平衡点。

四、德国战略文化的评价与展望

德国正处在战略文化深层次重构的关键时期。历史遗产、国内共识与国际形势变化交织在一起,使德国既要维系战后长期塑造的“和平主义”与“多边主义”传统,又不得不应对迅速变化的地缘政治竞争。二战后,德国将有限使用武力、强调国际合作的基本理念融入国家战略,积极参与国际机构,并以道义责任与自我克制为外交准则。近年来的国际局势动荡与国内政治变革正迫使德国战略文化在继承传统中寻求突破,实现从单一“有限介入”向兼顾实力与责任、安全与创新的复合型战略转型。

当前大国竞争日益激烈,地缘冲突频发,安全挑战层出不穷,战略环境复杂多变。这些形势要求德国在防务与军备领域增加投入,否则其难以在全球和欧洲安全体系中维持有效影响力。然而,德国社会对历史包袱的高度敏感性以及根深蒂固的和平主义传统,为其战略文化转型设置了较高的心理门槛。大众舆论、学界、政策制定者对于如何平衡多边合作与国家利益存在认知分歧,因此,德国的战略调整不仅需要在口号上有所改变,还需要在实践层面细致谋划、稳步推进。

在战后早期的研究中,德国战略文化常被简化为“和平主义—现实主义”的二元对立模型。尽管这一模型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德国有限使用武力及渐进主义的政策倾向,但它未能涵盖德国在全球治理、经济合作、价值原则及区域安全等多个领域所形成的多层次、复合式实践。进入21世纪,德国在多边主义、国际制度规则以及国内安全需求之间寻求平衡,采取了“双轨并行”“多轨互补”的方式来扩展国家战略空间。当下,地缘政治竞争日趋激烈,新型安全威胁不断出现,德国对“硬实力”工具的使用日益重视,尤其在国防预算、军事部署和欧盟安全政策方面动作频频,展现出更加成熟的地缘战略思维和更高的决策力。这一转变反映了德国战略文化中日益凸显的“双重身份”特征:一方面扮演欧洲和平秩序的坚定维护者,另一

方面持续强化自身安全能力,体现出务实的行为取向。在具体政策层面,德国注重“责任分担”原则,在处理国际危机的同时考虑欧洲内部团结、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以及德国战略自主性,使当代德国战略文化呈现独特的内涵。

2025年初,德国政坛迎来了重大变化,默茨就任新一届联邦总理之际,恰逢特朗普重返白宫,这一变化给德国的安全与外交政策带来了新的变量。在2025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美国新任副总统万斯明确要求欧洲承担起自身的防御责任,不能再依赖美国的安全保护。这推动了德国重新审视其安全战略,认为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应实施更主动的防务政策。长期秉持大西洋主义的默茨进一步强调“欧洲自主防务”理念,宣称美国对欧洲大陆的命运漠不关心,质疑北约的未来,并要求欧洲加强自身的防御能力。^①默茨提出德国应在欧洲发挥领导作用:“欧洲盟友都期待德国承担更大的领导责任。我一直在强调这一点。德国是欧洲人口最多的国家,位于欧洲大陆的地缘战略中心。我们必须履行这一职责。”^②这一政策转变旨在提升德国的国防预算,加快现代化军备采购,推进德法防务一体化,积极参与欧盟快速反应部队及北约前沿部署。默茨还认识到德国需要对乌克兰提供实质性支持,表示德国将继续支持基辅当局,在得到欧洲伙伴同意的前提下仍愿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巡航导弹。^③默茨公布的执政联盟协议宣布进行兵役制改革并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同时采取措施加快国防采购并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④这彰显了德国在新的地缘政治环境中追求更大国际话语权和领导地位的决心。

在外交层面,默茨表示将致力于跨大西洋关系的重塑,强调与法国、波兰等欧洲伙伴的深度合作,推动欧洲在地缘政治中发出独立声音。基民盟主张德国必须再次承担起欧洲的 leadership 角色,且这种领导模式是通过与法国、波兰以及欧盟的协同来实现的。默茨的目标是促进欧洲国家加强团结,在面对外部挑战时形成更为紧密的防御合作。在全球多极化趋势下,德国战略文化的重构不仅需要在国内进行理念更新、政策重塑,还需要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积极融入与范式创新。德国必须在

^① Katya Adler, “New German leader signals seismic shift in transatlantic relations”, *BBC*, February 24, 2025, <https://www.bbc.com/news/articles/cpv4n0dg3v3o>, 访问日期:2025-04-05。

^② 《德国外交安全政策:一切都将与从前不同》,德国之声中文网,2025-02-22, <https://www.dw.com/zh/%E5%BE%B7%E5%9B%BD%E5%A4%96%E4%BA%A4%E5%AE%89%E5%85%A8%E6%94%BF%E7%AD%96%E4%B8%80%E5%88%87%E9%83%BD%E5%B0%86%E4%B8%8E%E4%BB%8E%E5%89%8D%E4%B8%8D%E5%90%8C/a-71685724>, 访问日期:2025-03-05。

^③ Johanna Urbancik, “Germany is open to sending Taurus missiles to Ukraine, says Merz”, *Euronews*, April 14, 2025, <https://www.euronews.com/my-europe/2025/04/14/germany-is-open-to-sending-taurus-missiles-to-ukraine-says-merz>, 访问日期:2025-04-15。

^④ Andreas Rinke/Matthias Williams, “Germany’s Merz unveils coalition deal to spur growth, tackle migration”, *Reuters*, April 9, 2025, <https://www.reuters.com/world/europe/german-coalition-deal-expected-around-midday-sources-say-2025-04-09/>, 访问日期:2025-04-10。

国际制度竞争中保持独立性,同时提炼出一套既符合历史传统而又融入现实需求的战略体系。决策者需要在多个层面进行反复试验,把“观念—制度—政策”的相互作用机制发挥到极致,实现软硬结合的战略创新。

德国近年特别是默茨上台后的政策方向调整,一方面是对特朗普“美国优先”战略背景下德国传统战略模式的有力回应,另一方面也是一次系统性、跨层次的战略文化重构。过去德国长期维持的“有限介入、多边合作”模式来源于战后沉重历史包袱导致的自我克制和对国际多边制度的深度信任及依赖。然而,在特朗普治下,美国对跨大西洋安全承诺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使德国对美安全依赖变得脆弱且不可预测,促使德国不得不重新审视自身的战略定位,积极探索在欧洲构建独立自主防务体系的新路径。纵观欧洲层面,作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和战略枢纽,德国的地缘政治地位决定了其必须在区域安全体系中承担更多的领导责任。默茨明确提出以“欧洲自主防务”为导向,旨在通过调整国防政策和外交方略,推动欧洲国家在安全领域内承担更多责任。这一转型的根本目的在于摆脱单一依赖美国安全保障的传统模式,构建一个协调一致、能够有效应对区域威胁的新型安全架构。在这种架构中,德国希望通过与法国、波兰等欧洲国家的深度沟通和协作,实现共同的战略利益,建立一个既能维护区域安全,又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影响的合作机制。这种协同整合战略要避免欧洲内部出现明显的“主从”关系,力图使跨大西洋联盟在调整中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为欧洲战略自主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当今世界多极化格局深化,大国间的竞争日趋复杂,德国在战略文化重塑中需要主动寻找更具能动性的道路,延续战后反思与多边合作传统,在全球安全治理、数字创新、科技自主等关键领域谋求突破。对德国而言,传统的依托外部保护模式已难以因应迅速变化的国际局势;相较之下,更具自主性与灵活性的战略资源分配渐成政治共识。除了传统防务合作,德国未来或将在重大国际危机管理、经济安全以及北极事务等更为广泛的议题上提升话语权,强化其在亚太与非洲区域事务中的协调能力。在数字化、网络安全、供应链管理等方面的系统性布局,使德国有望在经济—安全交叉领域扮演重要角色,并借此扩充欧洲整体的战略深度。同时,因其经济体量与外交软实力的双重影响力,德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挑战、全球公共卫生以及人道援助等全球性问题方面,也将被寄予更高期望。在此背景下,德国的战略文化将倾向于面向更广阔的全球议程,通过制度演进与多层次伙伴关系积极塑造国际规则与标准。维持跨大西洋关系依旧是德国战略文化的根基,但对于新兴全球力量的布局与合作同样不可或缺。德国未来执政者要找到兼顾原则与灵活、力量与责任、传统与创新的平衡点,在立足国内共识与欧洲框架的同时,积极与新兴伙伴建立多维互动,确保保持并放大自身在全球舞台上的影响力。

责任编辑:郭 婧